

也谈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

——兼评几种现时流行的图书馆学理论

卿家康

随着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入，这些年已经触及“研究方向”等根本性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图书馆学通讯》再一次发起了对“研究方向”问题的讨论，这对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在《图书馆学通讯》发起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应该转变图书馆的研究方向，把图书馆学从“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方法”、“图书馆工作诸过程的内容和技术方法”这种自我研究中解放出来，要研究一种更本质、更普遍的社会现象及其规律。^①纵观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这种意见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一种研究倾向。这种研究基本上否定了传统图书馆学，致力于一种超脱图书馆学的、外延更大的理论的创立。它的最突出特点，就是研究的外倾性。所以，我们姑且称它为“外倾性研究”。在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倾向。这种研究也是突破了传统图书馆学的范围，也是深入到信息、知识、情报的层次，然而，它的目的不是创立一种新型理论以取代图书馆学，而是把有关信息、知识、情报的现有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引进到图书馆学中来，以充实、改造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的落脚点还是图书馆学。与“外倾性研究”相比，它的内聚性很鲜明。我们权且称它为“内聚性研究”。这两种倾向有共通之处：都是对传统图书馆学反思的结果，都是改造图书馆学的一种探索。

然而，这两种研究是否可行？图书馆学研究方向是否就一定这两者之一？假若不是，它们又有什么启发意义呢？看来，我们必须对上述两种倾向作具体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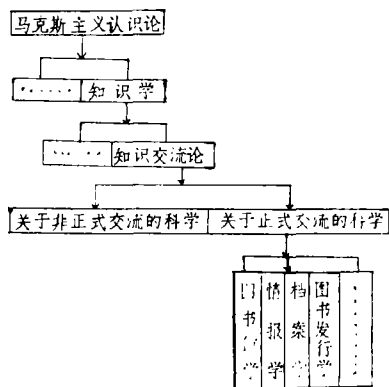
先看“外倾性研究”吧。发现图书馆学“馆内科学”的孤立性，提出图书馆学向“馆”外发展，并继而开展开放性的研究，这在国际图书馆学界起源颇早。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把图书馆当作社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交流思想的一种社会体系，并认为图书馆遵循着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这在方法论上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以巴特勒、谢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放性研究的实践，更是朝图书馆学甩掉“馆内科学”的帽子这个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英国的肯普和布鲁克斯进行“知识基础论”的探讨，美国奥尔和苏联米哈依诺夫致力于“交流系统论”的思考。向“馆”外伸展，国外确实早已有过探索。^②然而，由于前些年的封闭，国内了解到这种趋势是在七十年代末。这些年，国内图书馆学界也有过向新领域迈进的若隐若现的议论。这一次，终于有人系统地、尖锐地提了出来。猛击一掌，痛及深处，是有意义的。不过，考虑到上述的国际环境，我们光“破”是不够的，应该花真功夫于“立”。“破”不是目的，“立”才是目的之所在。

我们说转变图书馆研究方向这个意见的提出有其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意见与世界各国图书馆学向“馆”外伸展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国内这种意见是在全盘否定图书馆学，甚至否定图书馆学成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国外的探索都是为图书馆学探寻理论基础，并进而对传统图书馆学进行改造。学者们并非用它们来取代图书馆学，更没有因新领域的开辟，新方法的运用，新成果的出现而否定图书馆学的成立。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一个动态系统，都处

于发展变化之中。图书馆学的萌芽状态与今天的情形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它仍然是地道的图书馆学。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渐进以后,今天图书馆学正面临着革命,因为科学本来便是连续性的渐进和间断性的革命的统一”。③ 革命必然带来理论上的飞跃。但是,这种飞跃不仅没有否定学科的存在,相反,它正是深刻地、生动地体现了这门学科的生命力。学科的发展是金字塔式地层层相继,逐步接近顶峰,而非火箭发射式的一级一级脱落。既然图书馆学得以产生,并能在两千年间逐渐羽毛发达;既然它的研究对于图书馆现象是有特殊意义、特有功能的,并且图书馆事业步步兴旺,那么,图书馆学为何会失去存在的土壤呢?今天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这种低层次的理论缺乏一种比它更高层次理论的指导呢,还是确已走到尽头了呢?

在“外倾性研究”中,产生了“情报交流论”、“知识学”、“知识交流论”等较为典型的理论(笔者并不认为对这几种理论的研究与上述“外倾性研究”有完全一致的特征),且看这几种理论本身有何特点与不足。

这些理论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它们从图书馆这一社会实体中解放出来,在更普遍、更本质的层次来开展研究,给人以居高临下,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同时,如果说它们是图书馆学,显然都犯了以偏概全,不够准确的逻辑错误;如果说它们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则显得离图书馆这一层次太远,又不能贴切、具体地指导图书馆实践。明白人不难发现这些理论常常前一部分高深得很,可一涉及到具体的图书馆实践,便照样老生常谈,总让人觉得虎头蛇尾,甚不相称。说穿了,它们很少考虑到图书馆,甚至是比图书馆层次更高的文献信息系统的特征,立足点普遍偏高,以致于不能很好地与图书馆学相结合。下面,我们以图解来说明这种情况:(见下图)



知识学是对知识这一现象从整体上进行总结和概括,以弄清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理论④,它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而知识交流仅仅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活动,所以,“知识交流论”只能是从属于“知识学”的。知识交流本身又有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两种形式,图书情报等部门是属于正式交流的。由此看来,从“知识学”到图书馆学还有“知识交流论”这一中间层,以“知识学”作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显然不贴切。而“知识交流论”呢?它包括非正式交流,这又与图书馆工作性质不相符,范围过宽。在正式交流范围内对图书馆的研究,也跳过了对整个正式交流这一层次的研究,同样不是贴切的。

那么,对哪一层次现象研究的理论才是准确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呢?

说图书情报部门是信息行业,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而信息业务部门本身,通常是不产生知识的,它们所处理的乃是关于知识的信息,而非知识本身。由此看来,上述几种理论正是在这个本质点上发生了混淆。确实,图书馆学研究应该深入到信息、知识、情报的层次。然而,这里的知识与平时所谈的知识是根本不同的。请允许我们引进科学知识 with 科学信息两个概念。苏联学者认为,科学与科学信息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产生,关联于不同的科学活动方式。科学知识是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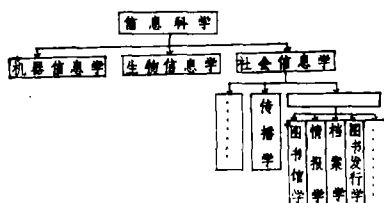
研究活动的产物,知识概念是从认识方面表达的人的认识过程的特征;而科学信息是科学知识在科学信息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信息概念则主要是从交流方面来描述人的认识过程的特征。^⑤图书馆不直接从事知识生产,只是进行知识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知识以信息形式出现,而且是文献化信息的形式出现。因此,准确地说,图书馆是从事文献信息交流的。之所以要强调图书馆交流的是文献信息,而非知识本身,是因为知识一旦转化为文献,便由一种主观的认识产物变成一种“客体”,这时,它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功能:1.文献是信息与物质载体的统一体;2.文献化是社会化知识传递的前提,它显著地扩大了潜在知识需求的范围,增加了感知信息的需求者的数量,为在一瞬间对知识的社会及个人的整体或个别检索创造了可能性。文献具有多功能性;3.文献化是信息集合的形式和手段,是信息系统出现的物质前提。基于这种分析,图书馆学主要地应该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理论,即研究文献化的知识及其交流,而不是作为认识产物的知识。否则,便偏离了方向。对知识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加以研究。认识论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高度来探讨知识问题;知识学则具体地对知识作整体考察;从知识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便是文献信息论。如果我们的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研究重复,或者不结合图书馆的特点就会迷失方向。

看来,“外倾性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方面,否定图书馆学成立时理论依据不足,违反了科学层次论原则;另一方面,实际探索中,几种理论模式立足点普遍偏高,而且,由于在关键概念上认识模糊,以致这种研究发生了方向性偏差。

也许有人会说,从以上引文看来,另一种新理论“文献信息论”是可行的,这不正是证明了“外倾性研究”的可行性吗?我们说,不能光看这理论本身如何,我们更要看

如何处理这种理论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接着,再来分析“内聚性研究”。既然这种研究也是对图书馆学的改造,那么,还是从图书馆学的改造谈起。学术界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传统的图书馆学存在的不是个别概念、个别专题等局部问题,而是整个学科理论规范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馆”内打转转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出路在于新领域的开辟,新视角的选取。实际上,最急需的是一种超出图书馆学的,以比图书馆现象更普遍、更本质的社会联系为对象的宏观理论的建设,并以之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统摄图书馆学各部分,指导图书馆学的改组。从科学研究层次论来说,图书馆学这种较低层次的研究已经存在,但与图书馆学最邻近的上位理论的研究尚付阙如。这种情况,从前面所列的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再以图示:(图二)



图书馆学是信息科学。在信息科学系统中,图书馆学属于“社会信息学”的分支。

“社会信息学”中,目前已有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传播学等科学,同时也有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图书发行学等以文献交流现象为对象的学科,但对文献信息交流的整体研究还没有开展。正因为这样,图书馆学等较低层次的学科总是找不到立足点,形不成理论核心,对这几门较低层次学科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宏观失控必然导致微观无序。从我们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急需研究文献信息理论,填补科学断层。“内聚性研究”也许能带来个别词句、观点的更新,但终究是修修补补的被动应付。因此说,“内聚性研究”对图书馆学改造的立足点偏低,这种自

我中心式的研究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根本方向。

前面我们已经否定了“外倾性研究”与“内聚性研究”两种方向,但是,在否定的同时,我们肯定了“外倾性研究”的突破精神,认为必须从图书馆学以外来寻找未来的生机;我们也肯定了“内聚性研究”以图书馆学的改造为目的,建立地地道道的图书馆学为出发点。笔者认为文献信息理论是准确的。我以为图书馆学之所以发展缓慢,不能归咎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非普遍性、非本质性的,或者说图书馆现象的低层次性,而是因为它缺乏一种合适的宏观理论的指导。因此,我们要探索文献信息理论。很明显,这种探索是为图书馆学的改造寻找理论依据——文献信息理论是用来指导图书馆学的,但决不可取代它的分支——图书馆学。

至此,笔者可以完整地表述自己对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看法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大方向是理论改造,而这种理论改造首先要在图书馆学以外探索一种以图书馆学现象为对象的理论——文献信息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指导图书馆学的改造。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

前面我们强调要严格区分科学与科学信息,因为这是我们确定研究方向的关键。然而,科学信息只是科学知识在信息活动领域的表现形式,两者有本质的联系,因而对知识的其它层次、其它角度的研究也是

图书馆学很重要的相关课题。我们说“知识学”、“知识交流论”、“情报交流论”不是准确的、贴切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但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研究的意义。况且,笔者的认识很肤浅,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只有实践才能最终证明这些理论谁更准确。目前我国学术界正面临开放宽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我们也需要打破我国图书馆学几十年一个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各有特色的学派。学派的存在,对科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各学派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学术传统,独特的研究方法,科学正是在各学派的发展及其对话中求得发展,接近真理。国外图书馆学就有文化学派、知识学派、社会学派,我们能不能也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学派?当然,如果我们能科学地、瞄准一个正确研究方向,也必然会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注释:

- ① 见“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
张晓林 载《图书馆学通讯》1985年第3期
- ② 见“论图书馆学领域的革命”卿家康 载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6年第1期
- ③ 同②
- ④ 见“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
彭修义 载《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3期
- ⑤ 见《信息学概论》〔苏〕Г·И·谢尔比茨基著刘克译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9.